

「官官相衛」觀感強 司法改革刻不容緩



近期大量市民向司法機關投訴時任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主觀偏頗，包括攻擊警員「講大話」，讚賞黑暴分子等等。司法機構昨日公布有關投訴的結果，認為針對何俊堯的司法行為投訴不成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同意總裁判官的意見。總裁判官

更指何俊堯獨立判案、不適宜干預。司法機構對市民投訴的處理，明顯有「自己人查自己人」、「官官相衛」之觀感，反映司法機構缺乏監督，沒有糾錯機制，更加凸顯司法改革的必要和迫切，才能挽回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何俊堯曾批評作供警員不可信、態度輕佻及蔑視，作供時猶如置身於「平行時空」及「大話咁大話」，並放生或輕判黑暴的暴徒。司法機構昨日表示，有8宗投訴針對何官，除了兩宗案因為律政司正向法庭提刑期覆核申請，要待司法程序完成才跟進，另外6宗案，總裁判官蘇惠德表示，經了解及閱讀裁決理由或判刑理由後，認為何官沒有表達任何個人或帶有政治傾向性的言論，亦沒有表面偏頗的情況，裁定投訴全不成立。

眾所周知，何俊堯是總裁判官的直接下屬，大家有緊密的工作關係，但是總裁判官沒有避席，反而直

接處理大量市民投訴何官的調查，顯然不恰當，可算是「自己人查自己人」，根本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獨立、公平、公正」的調查，不能不令人質疑司法機構處理投訴法官的機制形同虛設。

明顯存在「利益衝突」問題

筆者認為，這個調查結果並不穩妥，總裁判官表現偏頗，過分依賴律政司沒有向有關案件的裁決或判刑提出覆核或上訴，作為投訴不成立的借口。另外，司法機構沒有正面回應「暗升何官」的投訴，反映「官官相衛」和律政司把關不力，未能彰顯公義。

猶記得港鐵紅磡站爆出剪鋼筋事件時，社會有強烈呼聲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能任由港鐵公司自己人查自己人。換言之，自己人查自己人必然缺乏公信力。那麼，最強調「獨立、公平、公正」的司法機構，卻為何可以享受特別待遇，可以自己人查自己人呢？

「司法獨大」令人失望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表示，同意蘇惠德裁判官的意見，這正是橡皮圖章，實際是官官相衛，令人質疑馬官沒有全面審視調查的事實和理據，盲目為

蘇官和何官撐腰，破壞司法公正的核心價值。

若然市民不滿調查結果，可以用實名通過書面投訴連同相關的事實和理據，向特首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反映，要求覆核有關的調查結果。如果這書面投訴再被「司法獨立、不能干預」為理由拒絕，不禁令人質疑「司法獨大」，相信廣大市民便會對司法機構失望和失去信心。

故此，借鑒其他英美法系的國家，本港確實存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筆者敦促特區政府成立「司法監督和量刑委員會」，盡快進行公眾諮詢，挽回公眾信心。

着力紓困應對疫情 重啓經濟推動創新

劉佩瓊 香港浸會大學訪問教授

特首林鄭月娥將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去年的施政報告主要集中在房屋政策、教育、醫療、交通等。然而，經過反修例風波的衝擊，再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影響，香港對外交通大部分停頓下來，本地商業活動也隨着「限聚令」而停擺。政府動用公共財政儲備支援企業、保就業，更向全港市民派發現金一萬元紓困救急。

政府公布本財政年度首5個月開支3,601億元，收入1,275億元，錄得赤字2,326億元。錄得赤字主要原因是稅收滯後，以及防疫抗疫支出大幅增加所致。截至8月底，財政儲備為9,277億元，較2018年底的11,619億元減少了2,342億港元。2019年香港GDP為2.52萬億元，公共財政支出為5,377億元，約佔GDP的21.3%。今年為應付疫情，政府先後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共約2,900億元，達2019年香港GDP的一成。全年財政赤字由預算的1,391億元增加到2,766億元，即佔GDP的9.5%。

自7月實施香港國安法以來，本港社會已趨向穩定，疫情亦逐漸受控，但本港對外交通仍未完全恢復，「限聚令」仍未放寬的情況下，很多商業活動未恢復，失業情況仍很嚴重。

派錢難解困 須轉型求存

就業統計顯示，香港的失業率已由去年中的2.9%上升到今年中的6.1%，就業人數減少了14.47萬人，這是在「保就業」下的數字，實際失業人數應該超過40萬人。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建築、進出口貿易、批發、餐飲服務、旅遊住宿服務等。

去年訪港旅客仍有5,591萬人，今年頭4個月只有350萬人。也就是說，如果到年底本港仍未開關，全年只有約1,000萬人訪港，受影響最大的是航空業、酒店旅遊業、飲食業及零售業等。

在疫情下，大多數經濟社會活動被迫停頓，香港社會的承受力已到臨界點，再也不能靠臨時的派錢來解決問題。目前特區政府必須迅速採取措施，重啟經濟社會活動，令香港重新走上發展之路。

政府上兩輪的防疫抗疫已經從公共財政中投入3,000億元，這只能解一時之困。如果再大手派錢，外匯儲備將大量縮水。有人疑問，外匯儲備要留多少？其實也沒有準則。然而，如果香港要繼續維持亞洲區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要保持外匯自由進出及港元的自由兌換。否則，上海就可能取代香港。因此，我們要確保國際社會對香港有信心，相信香港的外匯儲備不會大量流失，也沒有恒常性的財政負擔而導致外匯儲備大量減少。

香港要扭轉劣勢，只有重啟經濟一途。但是，在未有疫苗、疫情未徹底受控之前，社會運作已經發生極大變化，我們不能期望回到從前。

我們的生活方式改了，社會活動方式改了，交易方式改了。因此，要從改變經濟結構着手，一方面鼓勵企業加快經營方式轉型，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引導及資助，建立彌補目前供應短板的經營及服務。

重啟經濟第一個面對的是，如何恢復開放關卡，對於香港這個外向型經濟是最重要的。而重新開放關卡，恢復人貨交流，疫情控制的成效是關鍵。目前最有條件恢復來往的自然是在內地，其次是日韓、澳紐及東南亞個別國家和地區。歐美疫情又有新一輪爆發，要嚴加檢疫限制；迅速建立互通健康碼是第一要務。

但有一些行業仍要捱起碼半年，例如外出旅遊、高級酒店等，只好轉型求存，要調整價格招徠新客源，而且會淘汰一部分，這些調整不能避免，不能單靠政府補助勉強維持生計。

創造新業務新就業崗位

那麼，香港如何創造新的業務發展及就業需

求呢？

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有些以支持製造業為主的服務，如物流、資訊、創意設計；有些是提供最後消費品的，例如傳統零售業；香港人日益提升生活質素，旅遊、健身、美容、養生也是重要的服務業。

一直以來，政府依靠市場主導發展新產業，以致新產業發展困難重重，例如租金昂貴令新產業背負沉重負擔。另外，香港人口老化，卻始終未建立一套養老制度。

但養老業發展面對不少困難。第一，養老服務不夠多元化。不同年齡、家庭狀況、經濟背景的老年人需要不同服務，香港社會服務機構只照顧較基層的老人；私立院舍主要照顧自費入住老人，服務覆蓋面很窄。

第二，養老機構面臨用地不足問題。香港土地資源稀少、且被高度壟斷，政府早就應該把養老用地納入解決土地房屋規劃之中，就像學校一樣進行土地劃撥使用，免養老機構捱租。可行的方法是在設計興建公屋、居屋以及在審批私人住宅用地時附加養老設施。

第三，養老業缺乏管理人才及醫護人員，需加強基層護理人才訓練及供應。養老業的專項服務，需要特殊技能，依賴目前醫護專業團體採用的傳統監管、培訓及供應，造成發展障礙。現在可以利用抗疫基金建立新養老機制，從培訓、資歷、院舍用地等方面着手，吸納失業人士，開拓服務，為香港人創造一個良好的養老環境。

另一個疫後發展方向，是把香港提升為生活真正數碼化的智慧城市，政府處理公務、市民服務建立簡單的數碼化處理。各種交易不能再停留在已經落後、單一的「八達通」經營模式，而要形成多元、互通的虛擬交易體系，這是一個大工程，政府正好吸納大量就業困難的大學畢業生，推動香港更現代化。



播「獨」是推學生進死胡同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教育局指一名小學教師因在教學中宣揚「港獨」而取消其註冊。這是回歸以來首次有教師因教學不當而被除牌，對於有教師因為個人政治取向而逾越教育專業底線，喪失教師資格，實在令人痛心；同時亦印證了筆者一向的主張，即「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是正确的。

教師被「釘牌」，意味着終生不能踏足校園工作。傳媒其中一個焦點，是這樣的刑罰是否過重？教育局表示，涉事教師的整個課程設計是帶領學生走向「港獨」。筆者認為，向學生散播「港獨」信息、宣揚觸犯國家民族底線的理念，但不符合基本法下香港特區的憲制和法律地位，教師的行為也嚴重違反專業操守，理應受到譴責及懲處。

從教育局披露的資料看來，今件事是嚴重的，因為事情並不只局限於網上流傳的一張工作紙，而是牽涉整套校本課程設計。若是一張工作紙，只涉及一位老師和一班學生，而校本課程則是有計劃、有設計的教案，一套完整的教案包括教學目標、教學策略和內容，以及評估方法。校本課程指揮的是一批教師，影響的是全級學生，而且可以年復一年去教。此課本編寫者就是「制獨」者，而按此課程施教的老師是「播獨」者，因此，是次受最嚴厲處分的人，是課程設計者而非執行者，是理所當然的。

就今次事件，有人說教師是以「港獨」為例子帶出「言論自由」，亦有認為是以「言論自由」作為切入點帶出「港獨」。誰對誰錯，孰是孰非，只要公開整套課程便一清二楚。事實上，在教育專業上，教師需要因應不同發展階段的學生，制訂不同的教學策略與內容，小學生與大學生的教法明顯有別，更何況「港獨」和「言論自由」在成年人中已爭論甚烈，況且「港獨」和「言論自由」既無必然關係，卻要小學生表態，這不是洗腦式教育，又是什麼呢？

無可否認，「港獨」是一個敏感題目，也是不能逾越的紅線，老師沒有必要主動去談論，即使要解惑，作為教育工作者，也必須引導學生認識「港獨」是犯法的，是死胡同。正如討論吸毒等課題一樣，教師不能只談利與弊，必須引導學生認識對與錯，結論必須引導學生走向正面，這些元素也必須在課程設計和教學內容中體現出來。

教育專業是保護學生而非保障教師，從保護學生利益的角度出發，即使教師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宣揚「港獨」等同把學生推向不歸路，萬萬不可為。然而，號稱「專業」的教協，不但沒有譴責失德行為，還千方百計予以包庇、尋求開脫，護短不護幼，既是对教育專業的褻瀆，也是对教育專業的踐踏。

朱立威 南區建設力量召集人

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下月中發布，政府早前表示在疫情及社會事件下，財政資源變得相當緊絀，因此報告內不會牽涉大規模的公帑使用；然而當局卻指未來施政需要加強「治安、經濟、公共衛生的防備」，甚有增加公共開支的意味，防守型公共投資或成為未來短期內施政的基本策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於去年初撰文呼籲各成員需就經濟衝擊做好防禦準備（Building Defenses），當中提到創新及保持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與現時發展「智慧城市」的考量十分相似。在後疫情時代，全球數字經濟因線上營運模式仍然保持蓬勃，按Visa調查所得，本港的電子商務交易量在疫情期間錄得一成的升幅，非接觸式交易量亦比以往增加七成。各國為紓緩公共開支的壓力，紛紛打算向增長中的數碼經濟徵稅。面對本地財赤及失業率高企的港府而言，完善發展數碼市場絕對有其必要。而且，本地培訓或引入創科人才因大灣區建設變得容易，讓政府投放的培訓成本或得以降低，促進打造完善智慧城市的步伐。因此，智慧城市除了讓我們更具備危機處理能力外，亦符合現時國際間審慎理財的大趨勢。

然而，上星期公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指數中，香港僅在全球109個城市中排名第32。過往公務員思維被批無法與智慧城市的創新連結起來，至本年初又被業界質疑需要急起直追。反映了即使受到疫情威脅，各自為政的官僚思維似乎仍然根深柢固，更遑論產生跨部門甚至跨界別共同協作的想法，推開了官商民之間的創科合作關係。

當務之急，政府應該將去年施政報告的創新焦點擴闊至整體市場，加強在疫情下的數碼轉型誘因並降低相關技術及成本門檻，並將其納入《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讓行政部門有據可依，為往後出現的挑戰作好準備。

讓人惋惜的是，反對派出於對科技發展的恐懼，由以往阻礙創科局成立至妖魔化智能燈柱及健康碼，以政治化手段窒礙城市的進步及市民的健康保障，甚至成為現在去留民調的政治操作、宣傳留任的政治工具，成為阻礙香港進步的一大障礙。



施政報告應為數碼創新布局

回應社會訴求改革通識教育

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教育局日前決定吊銷一名小學老師的註冊，原因是該老師被指其製作的教材和工作紙是有計劃地向小五生散播「港獨」訊息，故此犯了嚴重專業失德行為。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名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已被取締的「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的電視訪問。這事件或許只是香港教育問題之冰山一角。

近年有不少媒體揭露所謂「黃師」藉通識教材向學生灌輸扭曲的歷史常識、偏頗的政治思想，甚至「港獨」主張，例如「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偏激政治思想，結果毒害了不少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和觀念，令到他們接受違法集會示威和使用暴力來爭取政治訴求等違法行為。

當然在21世紀，通識教育若推行正確，有其實用價值，因為通識能夠塑造學生成為靈敏機

智的秀才，而且也能夠善用全方位來探討和批判問題。回歸後，特區政府開始改革教育，其中一項改革就是將學制改動為「三三四」。由於高中從兩年改為三年制，高中課程也因此而有所變動，結果是除了中、英、數為高中生必修讀的科目之外，再加入通識科。

儘管目前的通識科受到不少批評，畢竟面對全球化的局面，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和環球經濟環境，學生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和視野，並且也要知曉如何獨立分析和處理難題，這樣他們才能夠應付這個新世紀，在這方面通識教學就發揮了作用，因此筆者認同早前由教育局委任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建議將通識維持「必修必考」，但政府還是可考慮在課程內容上作出修改，以及修補目前通識教育出現的「漏洞」，截斷「黃師」荼毒莘莘學子的任何一個機會。教育局可以先從

這三方面開始進行：(一)教材指引和審核，特別是要審核一些政治是非判斷的問題，如何看待「一國兩制」、「佔中」、警察執法等。同時，應用客觀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社會多年的發展和存在問題，看待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提高國民身份認同的內容比重；(二)修改課程內易於被「別有用心」的教師用作向學生灌輸政治歪理和蓄意誤導學生討論熱門政治及時事事件方向的單元，例如「今日香港」；(三)加強通識教師的培訓和考核。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表示會於今年內向社會交代香港通識教育的未來去向，而筆者期盼特首能夠在月中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她的一些想法或指示，回應社會對改革香港通識教育的訴求，為香港孕育具廣闊視野和獨立、尖銳的思考能力，還兼對國家有承擔的守法良好公民。



優先實行大灣區人員往來正常化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特區政府宣布延長入境防疫管制措施至12月31日，相信許多有兩地往來迫切需要的市民都承受不住了。在當前香港第三波疫情基本受控的情況下，特區政府與內地協商，應該盡早採取病毒檢測、健康碼等先進手段，與內地實現通關正常化，特別是要優先考慮大灣區人員往來的正常化。

一場疫情無情地暴露了非常態下大灣區融合的「物理」阻隔。從2月至今，因為兩地強制檢疫隔離共28天，導致兩地居民的往來極為不便，處於幾乎停頓狀態。去年香港與深圳陸路口岸通關總人數2.36億人次，平均每天65萬人次。今年僅以9月份統計，開放的港珠澳大橋

和深圳灣兩個口岸，每天總通關人數不到2,000人次，相差325倍。人流不通造成的經濟損失、時間耗費以及合作受阻等，無法估計。

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防疫措施，我們都堅決支持。人命關天，極端情況下的任何非常措施都可以理解和必須執行。近期確診的本地源頭不明個案不斷，說明隱性傳播鏈仍然存在，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稍稍鬆懈就會出現第四波疫情。政府實施的防疫工作雖然取得成效，但不能因此而自滿，仍有改善空間。為了進一步找出社區中的隱性患者，政府可進取一點，針對某些行業從業員實行強制核酸檢測，例如：公共服務業、接觸服務對象前線工作人員、長

者、飲食業等等。現時本港檢測能力可達每日9萬個，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堵住隱性傳播。以更為主動的防控措施作為支撐，香港才有條件與內地協商，逐步實現通關正常化。

港人與大灣區聯繫緊密，投資創業、研發合作、工作學習、居住養老人數眾多，業務往來密切，需要實現人員、貨物、資金、信息的自由流動，而其中人流暢通是最基本的要求。大灣區建設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實踐，需要以改革開放的心態做一些先行先試的嘗試。非常時期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如何保持暢通，是這次疫情給我們的新課題、新挑戰。

